

专题篇

Special Topic

B.8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外投资贸易

赵凯 胡佳莹 陈泽平 郝一冰*

摘要： 本文收集整理了2016~2020年139个国家有关华人移民、中外投资贸易的相关数据，基于扩展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外投资贸易的作用效果，并进一步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异质性等。主要结果表明：（1）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能显著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华人移民网络在各国对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促进作用会受到限制。（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疫情中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且这些国家对华人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低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3）华人移民网络可以通过改善制度差异、消除信息不对称、弥合文化距离三种途径在双边投资贸易中发挥“桥梁”作用。

* 赵凯，经济学博士，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统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胡佳莹，华侨大学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陈泽平，华侨大学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郝一冰，华侨大学统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

关键词： 华人移民网络 新冠疫情 投资贸易 “一带一路” 异质性

一 引言

自 2019 年末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已经成为 2000 年以来一次巨大的黑天鹅事件。^① 世界各国为了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隔离、贸易限制、禁航禁运、停产停工、出入境管制等措施，大大推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壁垒，也为国际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2020 年，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萎缩 3.3%，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同比下降 39.4%，全球货物贸易萎缩 5.3%。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尽管最早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但 20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3%，对外贸易总额增长 1.9%，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长 12.3%，是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② 这些成就离不开中国对新冠疫情有效的防疫管控，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在疫情暴发期间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大力支持，这正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移民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移民团体之一。近年来，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华人移民网络逐渐发展、完善，客观上促进了所在国与中国的信息与文化交流。作为中国重要的关系资产，华人移民网络在中国与各国的投资贸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然而，随着全球新冠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面临着疫情带来的如经济冲击、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种族主义抬头和社会文化差

① 佟家栋、盛斌、蒋殿春、严兵、戴金平、刘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20 年第 3 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8/content_5589283.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异等不同领域的困难和挑战,^① 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也可能因此受到干扰,甚至中断、失效,那么原本依托华人移民网络建立的投资、贸易关系也必然会受到冲击。因此,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对中外投资贸易的促进作用,以及在疫情中这种作用的效果如何、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如何,都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同时,注意到不同类别的国家与我国投资贸易往来的战略、政策、环境不尽相同,国家异质性也是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问题。

综上,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外投资贸易的作用效果。首先,本文对海外华侨华人现状及中外投资贸易情况等相关内容展开描述性统计;其次,为了能够有效排除内生性因素的干扰、控制双向固定效应,并评估出疫情和华人移民双重差异对中外投资贸易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建立了扩展的双重差分模型,将疫情前后时间差异和国家华人移民规模差异的乘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准确识别出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外投资贸易的作用效果,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最后,本文根据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探究了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外投资贸易作用效果的异质性。此外,本文还对华人移民网络“桥梁”作用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内容相关的文献可大致归纳为华人网络与中外投资贸易、疫情与中外投资贸易两个方面。

首先,海外华人移民网络作为中国重要的关系资产,在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② 学者们对华人移民网络在促进中外投资贸易合

① 陈奕平、尹昭伊、关亦佳:《华侨华人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贡献、挑战与政策建议》,《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张秀明:《21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新变化》,载贾益民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作中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持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在投资层面，大量研究证实了华人移民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能够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如梁育填等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角度探究海外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关系，结果证实了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呈现显著的扩大趋势，说明华侨华人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① 吴群锋和蒋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海外华人网络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密集的地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② 同样地，华人网络在中外贸易中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如 Rauch 和 Trindade 研究发现，海外华人网络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③ 梁双陆等以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贸易引力模型发现，华人网络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魏浩和袁然研究认为，华人网络不仅会通过直接联系促进中国对海外华人所在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会通过间接联系带动海外华人所在国之间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⑤ 蒙英华等同样研究认为移民网络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概率与出口强度。^⑥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沈琳和彭冬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证明了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
- ① 梁育填、周政可、刘逸：《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地理学报》2018年第8期。
 - ② 吴群锋、蒋为：《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经研究》2015年第12期。
 - ③ J. E. Rauch, V. Trindade,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4 (2002) .
 - ④ 梁双陆、王壬场、顾北辰：《东南亚华人网络及其贸易创造效应》，《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 ⑤ 魏浩、袁然：《全球华人网络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 ⑥ 蒙英华、蔡宏波、黄建忠：《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水平;^① 张吉鹏和衣长军以 2005~2014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网络不仅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有正向影响,同时也有助于降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退出风险;^② 许阳贵和刘云刚研究发现华人移民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且相关性非常显著,表明华人移民对国际贸易具有积极的作用;^③ 刘政等研究发现华人移民存量正向影响双边进出口额,但这种影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对较弱,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华人移民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④

其次,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致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失稳、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新冠疫情防控导致境内外交通运输联系不同程度被阻断,带来了商品运输成本提高、交货日期延长、中间品与劳动力供应不足等问题,^⑤ 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然而,大部分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与其他各国间投资贸易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短期波动,如朱京安和王海龙研究认为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将有所下降,但疫情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短期波动;^⑥ 姜英梅研究认为中东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对其投资步伐可能放缓,但

-
- ① 沈琳、彭冬冬:《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当代经济》2021 年第 2 期。
 - ② 张吉鹏、衣长军:《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上海经济》2020 年第 3 期。
 - ③ 许阳贵、刘云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热带地理》2019 年第 6 期。
 - ④ 刘政、任芳好、蔡宏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经济纵横》2019 年第 4 期。
 - ⑤ 田素华、李筱妍:《新冠疫情全球扩散对中国开放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上海经济研究》2020 年第 4 期。
 - ⑥ 朱京安、王海龙:《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及政策应对》,《国际贸易》2020 年第 3 期。

长期来看，中国对中东投资前景依然向好；^① 孙嘉泽等从宏观层面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长短期内差异显著，短期内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总额明显下滑，但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将逐步回归到基准情景下的增长水平。^②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证实了华人移民网络在中外投资贸易中的促进作用以及新冠疫情对中外投资贸易的短期冲击，本文将基于此，结合华人移民和疫情前后中外投资贸易的相关数据，运用扩展的双重差分法探究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外投资贸易的作用效果，并进一步分析背后的原因、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三 现状描述

（一）中国对外投资情况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概述

2020年，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萎缩3.3%，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7399亿美元，同比下降39.4%。但由于对于新冠疫情的有效管控，2020年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37.1亿美元，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同比增长12.3%，占全球份额的20.2%，^③ 图1展示了2002~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位次。

表1展示了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从投资区域的角度看，除了对大洋洲的投资减少了30.3%外，2020年中国对其他地区的直

① 姜英梅：《中国对中东地区投资：疫情影响下的困难与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20年第3期。

② 孙嘉泽、李慧娟、杨军：《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价值链结构的影响》，《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1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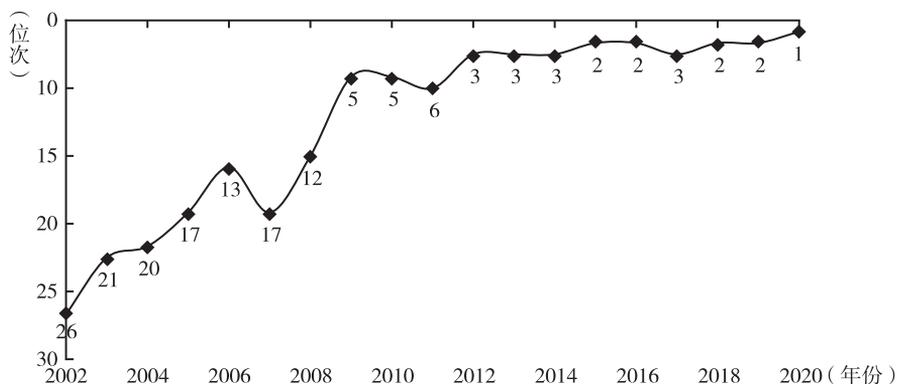


图 1 2002~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位次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接投资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增长最快，同比增加了 160.7%；流向非洲、北美洲的投资次之，同比分别增长 56.1%、45.1%；而流向欧洲的投资则同比增长了 20.6%。

表 1 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

单位：亿美元，%

洲别	对外直接投资金额	同比增长	所占比重
亚洲	1123.4	1.4	73.1
欧洲	126.9	20.6	8.3
非洲	42.3	56.1	2.8
北美洲	63.4	45.1	4.1
拉丁美洲	166.6	160.7	10.8
大洋洲	14.5	-30.3	0.9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虽然中国对亚洲的投资金额仅同比增长 1.4%，但根据图 2 展示的 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洲际分布，亚洲仍然以 1123.4 亿美元的总量，压

倒性地占据着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73.1%。其中对中国香港地区投资 89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占对亚洲投资的 79.4%，这说明香港仍是中国最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对东盟 10 国投资 16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3%，占对亚洲投资的 14.3%；^① 这说明中国—东盟一体化的程度日渐加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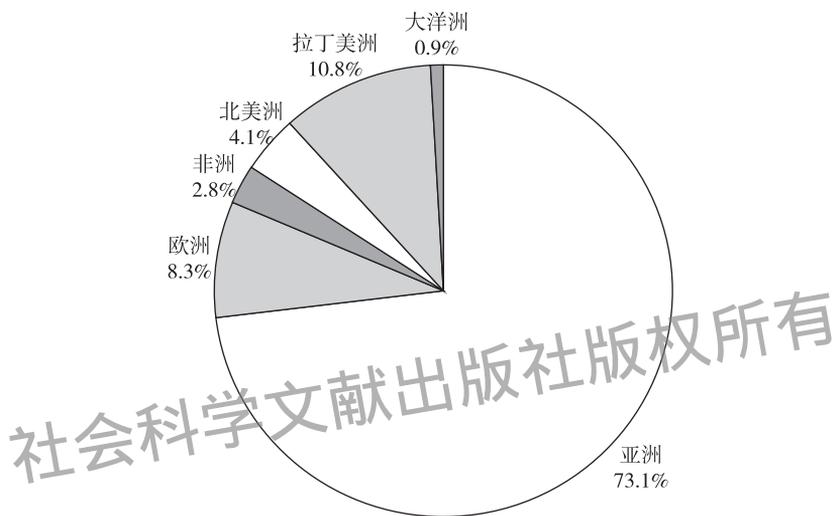


图 2 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洲际分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中国的境外企业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 2.8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4.5 万家，分布在全球 189 个国家和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7.9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25806.6 亿美元。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并购总体规模下降。2020 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 513 起，比 2019 年增加 46 起，涉及 61 个国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 282 亿美元，同比下降 17.7%。

图 3 展示了 2020 年中国境外企业在各洲覆盖比率。2020 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 189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4.5 万家，较上年末增加近 1000 家，遍布全球超过 80% 的国家和地区。图 4 展示了 2020 年中国境外企业各洲构成情况。从境外企业的国家（地区）分布情况看，中国在亚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超过 2.6 万家，占 58.5%，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越南等。其中在中国香港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超 1.4 万家，占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 30%，香港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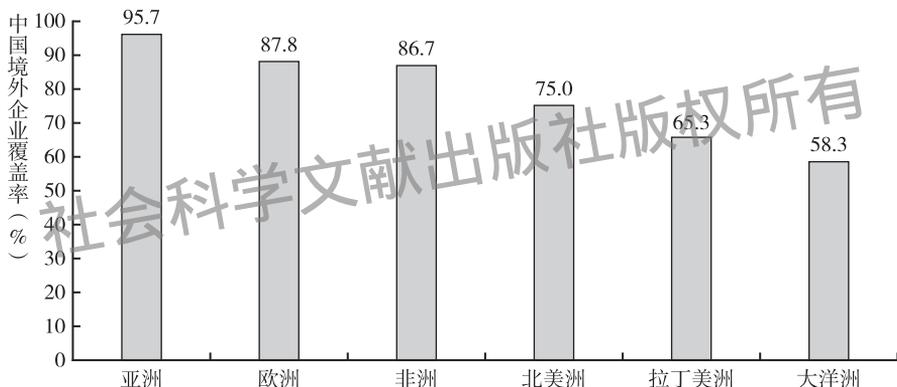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在各洲覆盖比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

2020 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3 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 1.1 万家，涉及国民经济 18 个行业大类，当年实现直接投资 22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4.7%，较上

^① 以上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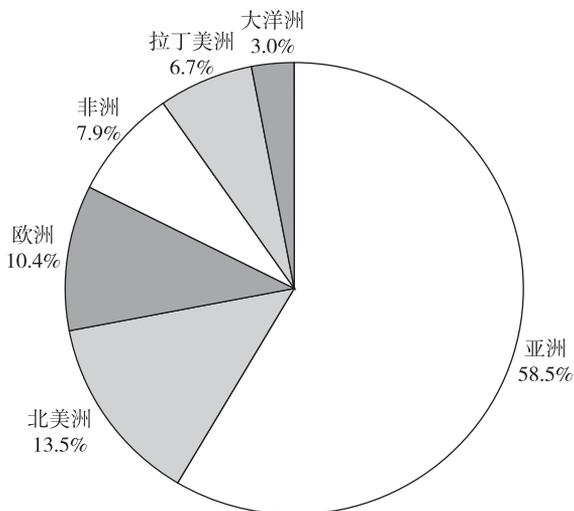


图4 2020年末中国境外企业各洲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年提升1个百分点。图5展示了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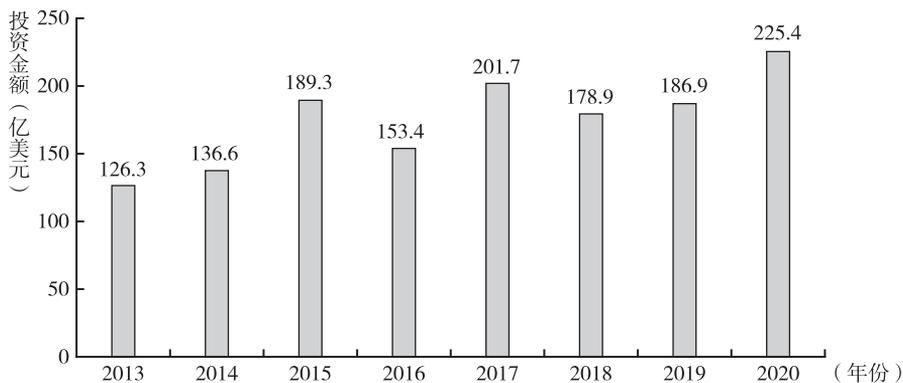


图5 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中国对外贸易情况^①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2020 年全球货物贸易萎缩 5.3%，这是自 2009 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得益于国内对疫情的有效管控，2020 年中国贸易出口总额上涨 4.0%，中国贸易进口总额受疫情影响不大，略微下降 0.7%。^②

1. 中国出口贸易

由图 6 展示的 2020 年中国出口贸易洲际分布可知，亚洲是中国出口贸易的第一大目的地，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 47.5%，欧洲和北美洲则分别为中国出口贸易的第二、第三大市场，分别占中国贸易出口总额的 20.7% 和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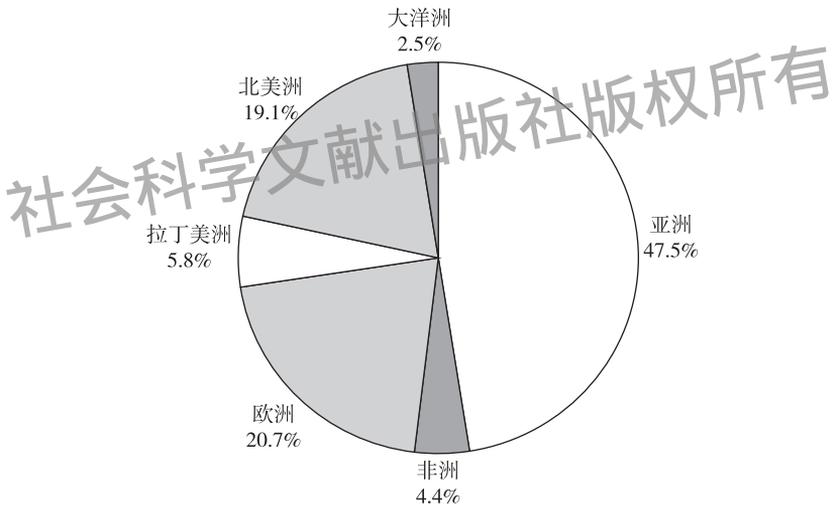


图 6 2020 年中国出口贸易洲际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制作。

由表 2 展示的 2019~2020 年中国出口贸易情况可知，新冠疫情对拉丁美洲消费市场的冲击较大，导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趋势由正转负；

① 本节主要对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进行分析，不考虑服务贸易进出口情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8/content_5589283.htm。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对亚洲、非洲、欧洲市场的出口贸易增长趋势有所放缓；相反地，新冠疫情却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北美洲、大洋洲两大市场的出口贸易。

表 2 2019~2020 年中国出口贸易情况

单位：亿元

洲别	2019 年		2020 年	
	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亚洲	84184.71	7.42%	85152.67	1.15%
非洲	7806.95	12.84%	7910.34	1.32%
欧洲	34467.44	10.02%	37109.12	7.66%
拉丁美洲	10482.14	6.92%	10431.43	-0.48%
北美洲	31413.40	-7.43%	34192.25	8.85%
大洋洲	4018.34	6.58%	4483.02	11.56%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2020~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制作。

2. 中国进口贸易

由图 7 展示的 2020 年中国进口贸易洲际分布可知，亚洲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是中国第一大进口贸易的来源地，占比 56.0%；欧洲则是中国进口贸易的第二大来源地，占比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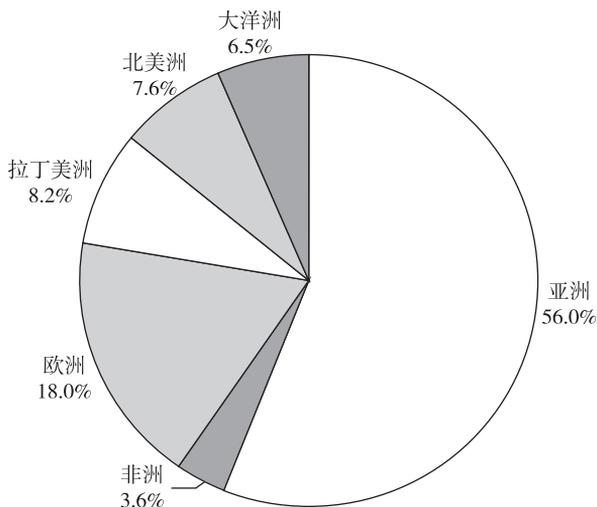


图 7 2020 年中国进口贸易洲际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制作。



由表 3 展示的 2019~2020 年中国进口贸易情况可知, 新冠疫情对中国和非洲、大洋洲、欧洲的进口市场冲击较大, 导致中国对这些市场的进口贸易总额呈现负增长趋势; 相反地, 新冠疫情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北美洲的进口贸易。

表 3 2019~2020 年中国进口贸易情况

单位: 亿元, %

洲别	2019 年		2020 年	
	进口总额	同比增长	进口总额	同比增长
亚洲	79048.44	0.43	80031.70	1.24
非洲	6594.16	0.70	5101.09	-22.64
欧洲	25987.61	3.76	25771.02	-0.83
拉丁美洲	11419.19	9.19	11737.09	2.78
北美洲	10421.77	-13.74	10890.19	4.49
大洋洲	9537.81	19.12	9262.69	-2.88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2020~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制作。

四 实证研究

本部分利用扩展的双重差分模型将疫情冲击和华人移民联系在一起, 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投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 结合各国人均生产总值、失业率、政府稳定性等控制变量, 实证研究了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中国与各国投资贸易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了背后的原因、作用机制与异质性。

(一) 模型构建

华人移民因其共同的种族、地缘或信仰等连接在一起, 能够形成庞大的族群网络, 并依靠着多层次纽带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网络, 传播和共享信息。^① 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日益增多、华人移民网络的日益发展, 华人移民

^① 梁育填、周政可、刘逸:《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地理学报》2018 年第 8 期。



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华人移民网络作为中国重要的关系资产，在中国和各国的经贸合作中也发挥出了日益显著的“桥梁”作用。然而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大大推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壁垒，使得中国需要与各东道国面对面接触的很多经贸活动被按下了暂停键。在此背景下，本部分旨在探究新冠疫情发生后，那些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相比于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其与中国的投资贸易水平是否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为了能在有效排除内生性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准确识别出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外投资贸易的影响，本文参照杨继东和杨其静、张充和何益欣的做法，^①构建了以下的双重差分模型，见式（1），其中第一重差分 $treat_i$ 将国家划分为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和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两类，第二重差分 $time_t$ 将时间划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

$$Y_{it} = \delta + \beta treat_i \times time_t + \varphi Controls_{it} + year_t + D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等式左边 Y_{it} 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投资层面，本文选取中国对*i*国的人均直接投资存量 $invest1_{it}$ ，作为衡量中国对外投资水平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并选取中国对*i*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数值 $invest2_{it}$ ，作为投资层面的替代被解释变量；在贸易层面，本文选取*i*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额的对数值 $trade1_{it}$ ，作为衡量各国对华贸易出口水平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并选取*i*国对中国贸易出口额占*i*国贸易出口总额的比值 $trade2_{it}$ ，作为贸易层面的替代被解释变量。等式右边， $treat_i$ 是衡量各国华人移民网络发达程度的虚拟变量，根据新冠疫情发生前一年时*i*国的华人移民存量占*i*国外来移民总存量的比例的均值划分而成，我们令超过此均值的国家 $treat_i$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与此同时， $time_t$ 是衡量新冠疫情暴发时间的变量，令2020年的 $time_t$ 取值为1，令2016~2019年的 $time_t$ 取值为0；最终构成核心解释变量 $treat_i \times time_t$ ，其系数 β 可以反映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相对于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其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往来的不同受影响

① 杨继东、杨其静：《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张充、何益欣：《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与省际贸易》，《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7期。



情况。另外， $Controls_{it}$ 表示一些影响中国与各国投资贸易的控制变量（详见后文）， $year_t$ 和 D_i 分别表示年份与国家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干扰项，下标 i 、 t 分别表示国家和年份。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冲击是突然的、同步的，无论是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实验组，还是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对照组，在疫情来袭时其与中国的双边投资贸易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由于不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华人移民网络对其与中国投资或贸易的影响都是同方向的，只是影响程度不同，所以使用扩展的双重差分模型后，虽然我们不能得到绝对完全的政策效应，但能根据系数 β 的估计结果得到实验组相对对照组的相对政策效应，若系数 β 显著为正，则表明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能更好地应对风险，与中国能有更高的投资或贸易水平，若系数 β 显著为负，则表明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与中国的投资或贸易水平反而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为了确定双边投资规模、贸易情况、国内生产总值等变量和数据，从而对公式（1）中的系数进行估计和分析，本部分从各个平台收集了大量数据（详见后文），剔除掉部分缺失数据和个别国家数据后，共采用了2016~2020年分布在各大洲共13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

1. 数据来源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库。此数据库于2021年9月和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此公报统计了2012~2020年中国对各国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数据。

（2）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此数据库目前统计了截至2020年各国间来往货物、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情况。本文选取了以东道国为数据报道国的2016~2020年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额数据以及各国各年总贸易出口数据。

（3）联合国经社部移民数据库。来源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部（UN DESA），该数据库每五年汇报一次跨国移民数据，目前一共发布了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9年各国间移



民数据。由于各国华侨华人数据不够完整或尚未统计，本文参考魏浩和袁然的数据选取方式，^① 从联合国经社部移民数据库中选取了新冠疫情发生前一年即 2019 年的各国华人移民存量数据及各国外来移民总存量数据，以衡量疫情发生时各国的华人移民规模。

(4) 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银行集团作为国际三大金融机构之一，是联合国系统下的多边开发机构，目前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五个机构，其数据库拥有全球各国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信息。本文的控制变量大多从中选取，包括多个国家 2016~202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土面积、政府政策稳定性排名等。

(5) 中国“一带一路”网。本文从该官网发布的各年份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表中，整理出 2016~2020 年各年份各国是否为“一带一路”合作国的相关数据。

2. 变量说明

表 4 列出了本部分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变量，包括变量的符号、解释及来源。

表 4 变量说明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invest1_{it}$	中国对 i 国人均直接投资存量	根据中国对 i 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和 i 国的人口计算得到,反映中国对 i 国的人均投资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
	$invest2_{it}$	中国对 i 国直接投资存量取对数	投资层面的替代被解释变量,用于稳健性分析	
	$trade1_{it}$	i 国对中国贸易出口总额取对数	衡量 i 国对中国贸易出口规模,贸易层面的被解释变量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trade2_{it}$	i 国对中国贸易出口额占其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	贸易层面的替代被解释变量,用于稳健性分析	

① 魏浩、袁然：《全球华人网络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续表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	$treat_i$	华人移民网络分组变量	衡量 <i>i</i> 国华人移民网络的发达程度,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 $treat_i$ 为1,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 $treat_i$ 为0	联合国经社部移民数据库
	$time_i$	疫情时间虚拟变量	衡量新冠疫情是否发生,2016~2019年 $time_i$ 为0,2020年 $time_i$ 为1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
控制变量	$para_i$	<i>i</i> 国人均国土面积	<i>i</i> 国国土面积与 <i>i</i> 国总人口之比	世界银行数据库
	gdp_{it}	<i>i</i> 国人均GDP	衡量 <i>i</i> 国经济发展规模	
	$unemp_{it}$	<i>i</i> 国失业率	衡量 <i>i</i> 国经济发展状况	
	$govstab_{it}$	<i>i</i> 国政府政策稳定性	为百分比排名,衡量 <i>i</i> 国政府各项经济贸易政策法规的变动情况	
其他变量	BR_i	虚拟变量; <i>i</i> 国当年是否为“一带一路”国家	新增控制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中国“一带一路”网

(1) 被解释变量。在投资层面,由于反向投资的存在使流量数据中含有部分负数和零值,且缺失值相对较多,故本部分选择数值更大且连续性更好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构造被解释变量;在贸易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贸易出口大国,以往文献大多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或直接研究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少有文献从各国对华贸易出口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2018年中国着眼于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而开始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鼓励各国企业向中国出口,本文据此最终选择了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额来构造本部分贸易层面的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现有研究多将华人移民存量作为衡量华人移民网络活动强度的衡量指标,一国的华人移民比例越大,该国的华人移民活动强度越高、影响力越大。基于此,本部分利用各国华人移民存量占该国总外来移民存量的比例来近似衡量各国华人移民网络的发达程度,将超过此比例均值的国家 $treat_i$ 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以此构建本部分的分组变量 $treat_i$,即

将样本分为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和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两类。与此同时，构建衡量新冠疫情是否发生的虚拟时间变量 $time_t$ ，2016~2019年 $time_t$ 取值为0，2020年 $time_t$ 取值为1。最终将分组变量与时间变量相乘构成本部分的核心解释变量 $treat_i \times time_t$ 。

(3)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本部分参考已有文献从国家层面选取了各国人均国土面积、各国人均GDP、各国失业率、各国政府政策稳定性这四个可能影响双边投资和贸易水平的控制变量，其中人均GDP和失业率能够反映一国的经济状况，这与其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水平皆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国的国土面积越大，其所拥有的资源越丰富，对进出口贸易或投资的需求可能也越大；一国的政府政策稳定性越弱，双边投资或贸易受到的阻碍可能越大。

(4) 其他变量。新增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一虚拟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表5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衡量各国华人移民网络发达程度的虚拟变量 $treat_i$ 的均值为0.4317，标准差为0.4957，表明各国华人移民网络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与此同时，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投资、贸易往来也存在巨大差异；各国的人均GDP，最小值为228.214美元，最大值为117197.48美元，各国的失业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高达29.12个百分点，标准差较大，表明各国经济贸易水平参差不齐、差异较大；其余控制变量也同样存在差异。

表5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reat_i$	0.4317	0.4957	0	1
$invest1_{it}$	0.1467	1.3132	0	19.2333
$invest2_{it}$	10.4712	2.6639	0	18.7846
$trade1_{it}$	19.7532	3.4594	2.4849	26.4736
$trade2_{it}$	8.0664	13.0376	0.00003	92.7803



续表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rea_{it}$	0.0362	0.0729	0.0001	0.5118
gdp_{it}	15153.102	20236.055	228.214	117197.48
$unemp_{it}$	7.4776	5.6878	0.1	29.22
$govstab_{it}$	47.0286	27.1634	0.4717	99.5283
BR_{it}	0.5281	0.4996	0	1

(三) 实证结果

1. 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6为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与各国间投资贸易影响的主要回归结果，共使用139个国家的共695个观测值，所有结果均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国家与年份的固定效应。由表6可知，各模型的调整后 R^2 均大于0.90，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投资层面的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1)列和第(2)列，其中第(1)列以中国对各国的人均直接投资存量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华人移民网络发达程度($treat_i$)与新冠疫情发生时间($time_i$)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0.0958，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疫情发生后，中国对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的人均投资存量相对更大，中国与其的投资往来相对于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更加畅通；表中第(2)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中国对各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数处理值，即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此时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0.1782，同样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

贸易层面的回归结果见表6的第(3)列和第(4)列，其中第(3)列以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额取对数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此时交乘项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为0.4205，并显著为负，这与投资层面的结果恰好相反，同样对于第(4)列，当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各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



的比值时，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在新冠疫情来袭时，相对于华人移民网络欠发达的国家，华人移民规模较大、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反而受到了相对更大的冲击。

对于贸易层面表现出的负向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直以来国际贸易之间规则差异巨大，特别是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受到各国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不同的影响，贸易交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而华人移民因为通晓双边市场运作规则、拥有双边人脉关系和沟通渠道优势，一直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扮演着联结沟通的重要角色，极大促进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但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贸易受限制、禁航禁运，中国与各国间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方式的贸易往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华人移民网络“桥梁”作用的发挥也因线下贸易受限而被严重阻碍。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也使得各国的消费减少、市场萎缩、出口驱动力下降，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大，最终导致了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在疫情来袭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受到了相对更大的冲击。而对于投资层面，华人移民同样可以通过信息传递等途径降低投资壁垒、发挥“桥梁”作用，当新冠疫情来袭后，虽然投资风险增大、各个行业发生结构性变化，但海外的投资机会也因此增多，为对外投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且相比于主要依赖于传统线下方式的双边贸易交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字化、线上化水平更高，即使国际线下经贸活动受阻，华人移民网络仍然可以通过线上途径传递双边投资信息，并继续通过充当东道国代理人等方式帮助中国境内投资者更好地抓住危机中的机遇，实现线上跨国投资，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得以发挥，最终使新冠疫情中中国对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实现了相对更高的投资水平。

由表6中控制变量可知，各国的经济水平 (gdp_{it}) 越强，中国对其的投资水平越高；各国的政府政策稳定性排名 ($govstab_{it}$) 越高，其进出口贸易政策相对更加稳定，也越有利于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



表 6 回归结果

	投资		贸易	
	(1) <i>invest1</i>	(2) <i>invest2</i>	(3) <i>trade1</i>	(4) <i>trade2</i>
<i>treat_i × time_t</i>	0.0958 * (1.79)	0.1782 * (1.67)	-0.4205 ** (-2.58)	-1.9332 *** (-2.97)
<i>parea_{it}</i>	5.8272 (1.04)	7.9254 (0.71)	17.4172 (1.11)	-192.7635 *** (-3.08)
<i>gdp_{it}</i>	0.00002 ** (2.39)	0.00003 ** (2.02)	-0.0000 (-0.14)	-0.0002 * (-1.85)
<i>unemp_{it}</i>	0.0196 * (1.65)	-0.0538 ** (-2.27)	-0.0237 (0.68)	0.0101 (0.07)
<i>govstab_{it}</i>	-0.0148 *** (-5.60)	0.00584 (1.11)	0.0043 (0.58)	-0.0114 (-0.39)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695	695	695	695
国家数	139	139	139	139
调整后R ²	0.9558	0.9572	0.9531	0.9474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普通标准误。

2. 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分析

为进一步证明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除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外，本部分还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新增控制变量法和替换解释变量来保证结果的有效性。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若无新冠疫情发生，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本部分采用事件分析法，此方法作为平行趋势的一种检验方法，通过设立基准组并生成每一年份虚拟变量和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进而能够考察政策发生的时间是否与实验组和对照组显著偏离的时间一致。本部分设定第 1 期（2016 年）为基准组，对投资和贸易两个层面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8 所示，其

中黑色实线与两侧虚线为交互项系数及其 95% 置信区间。

由图 8 可知，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的三年里，投资和贸易层面的交互项系数皆不显著，而在新冠疫情发生的 2020 年，投资层面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贸易层面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模型皆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也再次说明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有促进效应，以及当疫情阻断接触性贸易后，华人移民网络对各国对华贸易出口有反向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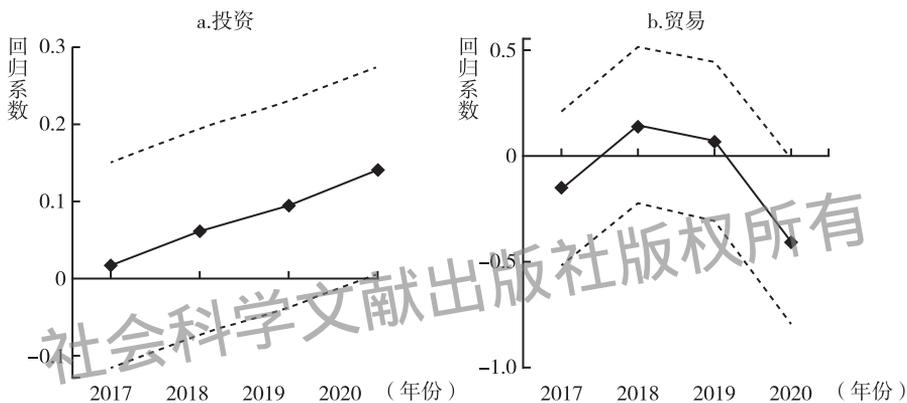


图 8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2) 安慰剂检验

为确定除了新冠疫情和华人移民网络的变化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其他政策或随机性因素也可能导致双边投资贸易水平产生差异，本部分参考顾和军、巴曙松等的做法，^① 通过随机抽取实验组和改变政策发生时点这两种反事实法分别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首先，为了排除偶然因素对结果的潜在影响，我们对国家进行了 500 次随机抽样，产生随机的伪处理组和伪对照组，由于伪样本是随机生成的，如

^① 顾和军、严蔚然：《空气污染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1 年第 11 期；巴曙松、柴宏蕊、方云龙、王博：《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吗？来自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研究》2021 年第 12 期。



果核心解释变量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则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因此我们将伪样本按照（1）式进行基准回归，画出循环随机生成处理组后估计系数的 t 值分布图，结果报告见图 9，由图 9 可知，投资或贸易层面的模拟回归系数的 t 值均集中分布在 0 附近，即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 6 中基准回归结果的 t 值在此安慰剂检验中是明显的异常值；其次，为确保在政策事件发生之前，双边投资贸易没有出现较大差异，即将政策事件设定在 2020 年之前的某个时期，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将不会显著，因此我们选取不存在新冠疫情的 2016~2019 年样本区间，将 2017 年和 2018 年设定为假想的政策发生年份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整理为表 7，由表 7 可知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由以上结果可知，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不受其他政策或偶然性因素干扰的，即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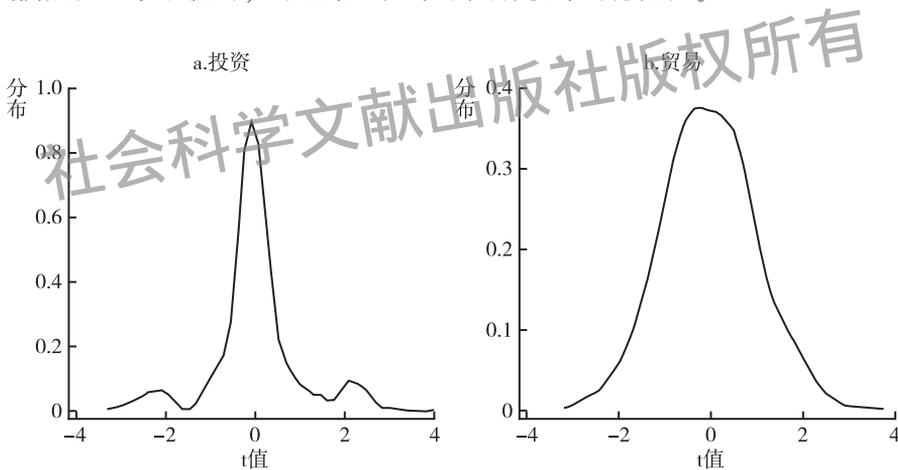


图 9 安慰剂检验 1 (处理组估计系数的 t 值分布)

表 7 安慰剂检验 2 (虚拟政策年份)

	投资		贸易	
	<i>invest1</i>	<i>invest1</i>	<i>trade1</i>	<i>trade1</i>
虚拟政策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treat_t \times time_t$	-0.0358 (-0.81)	0.0311 (0.69)	-0.2287 (-1.49)	0.1833 (1.16)

续表

	投资		贸易	
	<i>invest1</i>	<i>invest1</i>	<i>trade1</i>	<i>trade1</i>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556	556	556	556
国家数	139	139	139	139
调整后 R^2	0.9666	0.9666	0.9517	0.9516

(3) 新增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控制其他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部分在已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新增了“是否为‘一带一路’国家”(BR_{it})这一控制变量，对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整理为表8。

表8 新增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投资		贸易	
	(1) <i>invest1</i>	(2) <i>invest2</i>	(3) <i>trade1</i>	(4) <i>trade2</i>
$treat_i \times time_t$	0.1001 * (1.87)	0.1772 * (1.66)	-0.4279 *** (-2.62)	-1.9792 *** (-3.05)
BR_{it}	-0.0634 (-1.58)	0.0161 (0.20)	0.1310 (1.18)	0.8211 * (1.8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695	695	695	695
国家数	139	139	139	139
调整后 R^2	0.9559	0.9571	0.9531	0.9477

注：***、**、*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普通标准误。

结果显示，加入新的控制变量后，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有所变化，但作用方向并未改变，交乘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一步提高，结果具有稳健性，



即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各国的直接投资，且当疫情阻碍双边贸易往来、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受限时，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也会受到相对更为显著的冲击。

（四）异质性分析

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华人移民数量分布不同，与我国的投资贸易战略、政策、环境不同，因而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与不同东道国投资贸易往来的作用可能会存在差异。为此，本部分考察了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差异化国家可能具有的异质性影响效果。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秉持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为主要建设内容。因此，相对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疑与中国具有更为密切和通畅的投资贸易环境，并且在华侨华人数量分布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我们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个子集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整理为表9。表9中第（1）、（2）列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回归结果，第（3）、（4）列为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回归结果，回归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双向固定效应，结果调整后 R^2 均大于0.95，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9的结果显示，在投资层面，华人移民网络与新冠疫情发生时间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只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显著为正且显著水平达到1%，说明疫情发生后，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国华人移民网络发达程度与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水平呈正相关，即华人移民网络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对其直接投资的水平。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移民网络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在贸易层面，交乘项的系数皆显著为负，但第（4）列交乘项系数的绝对值比第（2）列的绝对值更大，说明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无论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人移民网络在贸易中的“桥梁”作用受阻时，华人移民规模较大、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都会受到相对更大的贸易冲击，但是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的贸易冲击

会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

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人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相对更低。中国与各东道国签署的“一带一路”相关协议属于国家间的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双边政治冲突和偏见带给企业的威胁，降低企业进行跨国投资贸易的风险，且中国国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规则掌握程度较高，最终会减少其对华人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其次，同样在面临新冠疫情考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全球新冠疫情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加强政策沟通和规则对接、不断深化合作，各种线上交易方兴未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尤其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同比缩水的背景下，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实现了逆势增长，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冠疫情中能够更快更好地化风险为机遇，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所以华人移民网络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桥梁”作用会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为重要与显著。

表 9 异质性结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 <i>invest1</i>	(2) <i>trade1</i>	(3) <i>invest1</i>	(4) <i>trade1</i>
<i>treat_t × time_t</i>	0.0037 (0.82)	-0.3392 ** (-2.18)	0.7632 *** (3.52)	-1.0168 ** (-2.3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67	367	328	328
调整后 R^2	0.9910	0.9597	0.9552	0.957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普通标准误。



（五）影响机制分析

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在投资层面还是贸易层面，华人移民都在中国与各东道国之间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当新冠疫情的来袭使全球经济贸易受到重创、国际投资贸易大幅度萎缩时，华侨华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华人移民规模越大、华人移民网络越发达的国家在新冠疫情中能够更快地恢复创伤、更好地抓住投资机遇，提高中国对其投资水平，而当新冠疫情使华人移民网络在贸易中的“桥梁”作用受阻时，各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也会受到相对更大的冲击。基于此，本部分讨论了华人移民网络促进双边投资和贸易的具体影响机制。

①制度方面：中国与各东道国间的政策和制度差异不利于双边达成商业共识并会增加直接投资和贸易往来所面临的风险，是阻碍双边进行投资贸易的重要因素。华人移民网络作为母国的关系资产，在双边进行投资时，因华人移民熟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可以在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充当代理人，帮助企业与当地合作者更快地达成共识、降低企业跨国投资的成本与风险；在双边进行贸易交往时，华人移民同样可以借助其对双边进出口贸易政策和规则的了解，成为双边贸易中介商，帮助克服双边贸易障碍，消除贸易壁垒，促使双边贸易便利化。

②信息方面：中国与各东道国地理相隔，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中国企业无法准确获知东道国的消费偏好、市场需求等信息，或者往往为了获取这些信息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这会限制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和贸易的意愿。而华人移民一方面与母国仍然保持着信息、情感、资金等联系，另一方面也通晓东道国的市场运作规则、商业惯例等，可以在化解此类信息不对称方面作出显著的贡献，如通过华文传媒、社交平台等各种途径传播分享双边信息，产生信息共享效应，提高双边进行投资或贸易的倾向，降低额外的信息获取成本，最终降低跨国投资和贸易的成本。

③文化方面：当中国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过大时，会增加中国企业获得投资贸易机会的难度，企业在进行投资贸易时所面临的语言、文化等沟通障

碍，也会导致信息失真、理解偏差等问题，合作的难度也大大提高，因此会产生隐形的文化壁垒。而华人移民一方面熟悉汉语、继承了母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长居海外对当地文化比较熟悉，能够发挥出“文化桥梁”作用，增进双边进行投资贸易等活动时的沟通和了解，加强合作互信，弥合双边文化距离。

总的来说，华人移民网络可以通过改善制度差异、消除信息不对称、弥合文化距离三种途径在双边投资贸易中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可以降低双边投资风险和交易成本，提高双边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双边贸易壁垒，促进双边贸易畅通。另外，结合基准回归结果和影响机制分析结果可知，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华人移民网络对双边投资和贸易的作用表现出差异性，当各国的防疫政策使双边人员往来与物流运输等经济活动受阻、线下投资和贸易受限时，华人移民网络仍然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但其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被抑制，使得原本越依赖华人移民网络联结作用的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双轨道发挥，但由于新冠疫情前贸易主要依赖传统线下方式实现，而投资受线下约束相对较小，使得疫情中华人移民网络仍然能够通过线上途径促进中国对外投资，但其对双边贸易的“桥梁”作用暂时被阻断。因此，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时，也应将以往的线下贸易转移到线上，加快实现贸易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不仅可以提高双边贸易交往的抗风险能力，也能更好地发挥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的投资层面数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完整性较高的《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贸易层面的数据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华人移民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社部移民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一带一路”网等。本文首先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新冠疫情展开了描述性



分析，再以 2020 年发生的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扩展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在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与各国间投资贸易的作用效果，并结合“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终得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并依据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由于对新冠疫情的有效管控，2020 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均逆势上涨，但新冠疫情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冲击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对华出口贸易受到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较大，而中国与北美国家间的投资贸易均在疫情中实现了逆势上涨。另外，虽然新冠疫情阻滞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华出口贸易，但中国仍在继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

第二，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华人移民网络仍然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华人移民网络在中外贸易中的“桥梁”作用因为疫情受到了限制。华人移民网络能够在中国与各国的投资贸易往来中发挥显著的“桥梁”促进作用，当新冠疫情来袭时，线下经贸活动大大受限，而华人移民仍然能够通过线上途径传递双边投资信息，帮助中国境内投资者化危机为投资机遇，显著提高中国对各国的直接投资水平，华人移民网络在投资层面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显现出来；但跨国贸易主要依靠传统线下商品服务运输来实现，而新冠疫情大大限制了华人移民网络在线下贸易中“桥梁”作用的发挥，使得疫情前华人移民规模较大、华人移民网络较发达的国家在疫情中其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受到了相对更大的冲击。此外，华人移民网络主要是通过改善双边制度差异、消除双边信息不对称、弥合双边文化距离这三种途径降低了中国与各国间进行投资贸易的成本与风险进而发挥了对双边经贸的“桥梁”作用。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冠疫情中表现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且它们对华人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低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上全球新冠疫情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加强政策沟通与规则对接、不断深化合作，线下经贸活动受阻时，各种线上交易方兴未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在疫情中仍

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且由本文实证结果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人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相对更低，中国与各东道国签署的“一带一路”相关协议减少了双边政治冲突和偏见、增进了国家间对彼此商业规则的掌握，降低了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或贸易的风险，最终减少了其对华人移民网络的依赖程度。

为了谋求中国与各国投资贸易的长期发展，更好地发挥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在政府层面，华人移民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且当新冠疫情缓解后，华人移民网络的线下“桥梁”作用不再受限时，华人移民网络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华人移民网络在中国与各国投资和贸易中的“桥梁”作用，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国外华人移民网络的建设，采取积极的移民管理政策激励华人移民网络对投资、贸易的促进作用，如设立相关中介机构加强华人移民与中国的联系，经常性地举办国内企业与海外华人移民、华侨团体、海外华商的相关联谊活动以增进双方信息交流等^①，也可以举办线上海外华商进口博览会，帮助华人移民网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发挥对中外贸易的“桥梁”作用。其次，在企业层面，中国国内企业应该积极合理运用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国外市场信息、更快地熟悉当地的制度法规和文化偏好、降低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贸易的风险，如多参加政府举办的华人华商联谊活动、多加入世界华商大会等华人组织。最后，在“一带一路”建设层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由于华人移民网络的“桥梁”作用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双轨道发挥，且此次新冠疫情使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表现出了差异化作用效果，线上渠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

^① 包大伟：《海外移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财经大学，2020。



加快构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元化线上贸易渠道、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进程，如搭建线上进口贸易洽谈合作平台、构建线上进口通道等；^① 中国企业也应用好线上渠道、加快贸易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高贸易成交额。加强政府与企业协同合作，通过推进并完善投资与贸易数字化、线上化，发挥出华人移民网络的线上“桥梁”作用，提高双边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实现共同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魏浩：《中国进口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与应对策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期。